

10.04

金湖革命传统教育资料

第二辑

86



金湖革命传统教育资料

第 二 辑

中共金湖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一九八六年六月

序 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五周年的前夕，县委党史办整理编印的《金湖革命传统教育资料》第二辑与大家见面了。书中十篇革命回忆录的作者，大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在高宝湖西工作过的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当年，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曾跃马挥戈，驰骋于三河两岸，为开辟和收复这块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他们又响应党的号召，回顾战斗历程，总结历史经验，给我们送来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教育和鼓舞全县人民继续努力奋斗，建设好这块地方。在此，我谨代表中共金湖县委，向革命前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这几篇回忆录中所列举的大量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解放战争时期的高宝湖西，经历了艰难而又曲折的斗争过程。一九四六年秋，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大举进攻我路东解放区，我主力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曾一度撤离过这块建立多年的根据地，三河两岸重又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不久，我淮南子弟兵和地方武工队便奉命挺进敌后，燃起了游击战争的燎原烈火。经过几进几出的艰苦斗争，许多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终于使淮宝、高宝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成为我军收复淮南的重要基地。在这场关系到高宝湖西前途命运的大搏斗中，虽然环境十分险恶，斗争异常残酷，但是，我们的前辈们胜利地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从这些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敌后斗争中，党的领导是何等的坚强有力；领

导作风是何等的民主和实事求是；党员干部遵守党的纪律是何等的自觉和严格，完成党的任务是何等的英勇顽强；干群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无间；群众对党和政府、对自己的子弟兵又是何等的拥护爱戴……。所有这些，不仅是革命前辈们当时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重要因素，也是战争年代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生动体现。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指导我们当前党的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希望全县各级党组织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把革命传统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要善于运用本地的历史教材，紧密联系当前实际，对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生动具体的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以激励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保持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精神，把金湖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富裕，这是继承革命前辈光荣传统的最好行动。

中共金湖县委书记 苏金必

一九八六年六月

目 录

(按时间先后为序)

序 言	苏金必
难忘的岁月 曲折的斗争	孟家芹、陶冶、李锐 (1)
忆淮宝敌后的艰苦斗争	万立誉 (19)
在 敌 后	徐速之 (28)
塔儿集伏击战	徐征发 (40)
奇袭南官庙	杨 谦 (45)
把红旗插到长江边	魏 然 (49)
九顷滩上两昼夜	杨在峰 (61)
坚持在高宝湖上	召建农 (65)
关于恢复淮南路东根据地的战斗情况	李世焱 (69)
银集攻坚战	霍薄凌 (76)

难忘的岁月 曲折的斗争

——忆高宝湖西的第二次解放

孟家芹 陶 滔 李 锐

高宝湖西地区位于津浦路东，三河以南，苏皖两省和高邮、宝应、天长、盱眙四县的结合部，原属国民党高邮八区、宝应七区（还包括天长、盱眙一部分）。一九四〇年春，我党在这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开始称为高邮县，后与天长合并，改称天高县。由于这里具有三面环湖、芦苇丛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特殊自然条件，加之抗日民主政府厉行减租减息，大兴水利建设，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生产发展，使美丽富饶的高宝湖西，成为淮南的可靠后方和著名的鱼米之乡，是当时路东八县中出兵、出粮、出钱最多，对前线贡献最大的一块地方。在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们党同勤劳朴实的高宝人民建立了血肉难分的深厚感情，凡在高宝湖西工作过的同志，对此都难以忘怀。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十月，华中苏皖边区政府成立，天高分开，高宝湖西改称高宝县，下辖金沟、黎城、东阳、马坝、闵塔、银涂、南湖、北湖八个区，五十二个乡，约二十万人口。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纠集大军进攻淮南；九月，高宝干部奉命北撤山东。从此，这块建设六年半之久的根据地，又处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下。

一九四七年春，为了配合正面战场我军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我淮南子弟兵和高宝武工队从山东南下，重返高宝湖西，在党的坚强领导和主力部队的有力配合下，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历尽艰辛，几经周折，终于逐步把胜利的红旗插遍全县，使这块地方成为我军收复淮南的一个重要基地。

高宝湖西的第二次解放，是这块根据地建立以来进行的一场最艰苦、最激烈、时间最长、反复最大的斗争。在同敌人进行的生死搏斗中，不少党员、干部、战士、群众为了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将永远为人民所尊敬和怀念。这段难忘的岁月虽已过去快四十年了，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现着重从当时的地方工作方面作一些回忆。

打 回 高 宝 去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七月中旬，战火烧到了淮南，敌人在占领我津浦路西地区之后，紧接着又调集其嫡系王牌新五军四十五师、九十六师和整编第七十四师五十八旅，共约三万余人，分两路向我路东地区大举进犯。由于敌众我寡，不宜硬拼，我军主力在完成抗击任务后，于七月底主动撤出淮南，向苏北、苏中转移。当时，高宝县金沟河西的东阳、马坝、黎城、金沟等地均已被敌占领，成为游击区，但小河东的闵塔、南湖、银涂、北湖四个区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退守小河东的高宝及天长一部分地方干部和武装，在淮南区党委副书记李世农同志的领导下，坚持就地斗争达两月之久。在此期间，县

委曾作过长期坚持的打算，如修筑工事，加强联防，突击锄奸，收藏粮食，建立小被服厂等等，以便随时迎接主力反攻，收复淮南。但是，进入九月中旬之后，由于两淮失守，苏中告急，主力打回淮南暂时已不可能，如果运河线全被敌人控制，小河东便无退路。为此，淮南区党委于九月二十二日向高宝县委发来急电，要我们迅速组织干部、武装撤退，务必在第二天上午九时前到达宝应。接到电报后，县委书记孟家芹、组织部长陶滔随即分头到各区传达，经过一昼夜的紧张工作，撤退人员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越过宝应、高邮湖，终于在第二天按时到达了预定的集中地——宝应城以南二十里的刘堡，与先期撤到这里的部分高宝干部汇合。因为情况来得突然，所以我们都是怀着依依难舍、又不得不走的复杂心情，分头坐船从唐港、夹沟出发离开高宝的。先后撤到刘堡一带的人员开始达数百人，大都是县区乡三级的骨干。根据当时的特殊情况，我们曾动员一些同志回原地坚持隐蔽斗争，因而实际参加北撤的约一百余人。大家眼看着长期以来和我们相依为命的父老乡亲，不久将在反动派的皮鞭下重新当牛做马，每个人都心如刀绞，暗暗发誓：乡亲们，等着吧！我们一定会尽快打回来的！

我们在刘堡稍作停留，便整队向苏北转移。经过陶林、射阳，于九月下旬到达淮南区党委的临时驻地——东沟、益林。不久，由区党委领导李世农、桂蓬同志率领，又继续北上山东。各县成立一个干部队。高宝县由孟家芹任队长，陶滔任指导员。我们从东沟益林出发，路经周门、沭阳、新安镇、临沂，于十月下旬到达山东莒县葫芦套地区，进行休整学习，主要是进行形势教育，总结北撤教训，解决思想问题，

坚定胜利信心。当时，我们虽然人在山东，但心在高宝，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远方的亲人，急切地盼望着上级快点下达返回淮南的命令。华东局、华中分局和淮南区党委的领导很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先后都来驻地看望我们，给大家做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使我们懂得了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必须集中力量打运动战才能战胜敌人的道理，认清了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光明前途。上级领导还从当时战争的全局需要出发，对北撤人员作出了三种安排：一是直接到野战军工作；二是到华东政治干部学校学习；三是组织少数精干武装回淮南敌后打游击，配合主力反攻。会后，经过大家报名和领导批准，决定高宝县首批南下打游击的同志，由孟家芹、陶滔、汤序朋（原是天长干部）三人负责。后来淮南工委成立时，又宣布我们三人为淮南第五工委委员，孟为书记，军事上成立便衣武工队，汤为队长，孟为政委，主要活动范围为高邮湖西、三河以南及天长地区。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我们怀着即将重返故乡的无比激动的心情，从山东出发，踏上了南下的征途。经过十天左右的行军，于十一月下旬到达华中分局驻地沭阳县丁庄。受领任务后，我们即抓紧时间挑选干部，组建武装，进行思想和物质准备。确定首批打回高宝的武工队成员，由孟家芹、陶滔、汤序朋、赵玉书、王定安、嵇华、王聚成、查才衡、王道才、纪珍、王吉祥、王俊、王珍、闵洪基（孟家芹的警卫员）、陈宝扬（陶滔的警卫员）、陈武军（汤序朋的警卫员）、×××等十七人组成。每人都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衣，配备了武器，华东军区还拨给我们一挺轻机枪。不久，我们便离开沭阳东边的章集继续南下。当时，苏北、苏中很多地方都

在打仗，局势变化无常，情况相当复杂。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避免无谓牺牲，根据领导指示，我们绕道而行，一路上边打边走，在沿途部队和地方同志的热情协助下，先后经过汤沟、张东集、响水口、黄圩、六铺，在周门找到了十二纵队司令部，跟随陈庆先司令活动十多天后，随三十四旅政治部主任杨效椿所率一〇〇团二营一道南下，经陆集、益林、杨集，在罗桥与下乡“扫荡”的一千余敌军遭遇，我军冒着大雪与敌激战。此时，杨效椿同志命令我们单独走。我们十七人又返回杨集，乘船穿过马家荡，于一九四七年春节前到达当时苏中二地委所在地——宝应县射阳镇油坊头。因当时敌人对运河线封锁很严，暂时过不去，苏中二地委指示我们，随地委机关一起在射阳湖一带打了不少天游击。在这段时间里，有一批北撤时没能赶上队、暂时隐藏在运东一带坚持斗争的高宝干部，听说我们南下回来并即将重返高宝，纷纷赶来归队，武工队扩大到三十多人。

一九四七年三月下旬，由张百镗、徐速之率领的淮南第二工委、第二支队一百四十多人，从山东南下到达射阳。我们两支队伍汇合在一起，于四月上旬在宝应的黄浦与八浅之间，一举突破了敌人的运河封锁线，胜利到达了淮宝县，从而结束了我们四个多月来几经辗转的长途跋涉。当时，由三十四旅政治部主任杨效椿同志率领的一〇〇团二营已在淮宝作战数月，打开了局面，为重返淮南开辟了道路。从此，三支队伍便在杨效椿同志的统一指挥下，揭开了向淮南敌后进军的序幕。

立足小 河 东

我们到达淮宝不久，便派人前往高宝侦察，得知在我们北撤不久，敌人便在这块地区重建了高邮八区、宝应七区及乡、保等顽政权，大批流亡在外的地主土顽纷纷还乡，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大搞复田倒租，采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残酷迫害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造成一片白色恐怖。据不完全统计，惨遭敌人杀害的我党员干部有五十余人，革命群众数百人，被逼迫自首的党员有一千余人。因塔区双庙乡党员干部龚八奎、凌正、盛福元、闵大文、陈玉连、虞明生、卞玉、虞华等八人全被土顽一次杀害；银涂区福连、九连乡党员干部叶开俊、杨永太、张桂英、华宝银、何春江、李长勤、李长根等七人，被还乡团用石块坠下银集大河壮烈牺牲；黎城区官塘乡顽乡长吴九钧等土顽，一天中就杀害我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四十九人，北湖区先后被土顽关押、拷打的群众多达两百余人。敌人的血腥暴行，真是罄竹难书。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挣扎的广大群众，做梦也在盼望我们快点打回来。自我军基本收复淮宝地区后，三河以南的敌正规军已全部撤走，高宝境内一些人数不多、装备较差的土顽武装惊恐万状，他们加强了戒备，在大堤上修筑工事，每隔三里设一个岗哨，日夜巡逻，发现情况，便鸣锣为号，妄图阻止我军重返淮南，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敌人的凶残暴行和狂妄企图，激起了我们的满腔怒火，大家打回高宝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强了。

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在杨效椿同志指挥下，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深夜渡过三河，突袭黎城，摧毁敌人一个

区署和两个乡公所，打响了收复淮南的第一枪。接着，杨效椿支队和张徐支队曾先后两进西山，打算在盱来嘉山区建立游击基地。但因山区敌人兵力较强，防守较严，一旦发现我军，立即跟踪追击，我军很难插进去、立住足，只得暂时退守三河中间的衡阳滩，另想别法。战后，杨效椿同志主持召开了民主总结会，广泛征求大家意见。熟悉本地情况的高宝干部，纷纷提出到小河东去立足的建议，认为小河东是水网地区，有湖有滩，还有大片“青纱帐”，敌人的大部队展开不开，有利于我小股武装打游击；小河东离高邮、宝应、天长、盱眙都比较远，是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而我們在那里却有多年的群众工作的基础，容易生根立足；小河东还有淮宝作为后方，一旦情况不利，随时可以转移。经过一番认真讨论，领导采纳了这个主张，从当时实际出发，及时地作出了把立足点从山区转移到小河东的决定。

当时的小河东，北部的唐港、涂沟、银集等地属国民党宝应七区；南部的冈桥、塔集、夹沟、横荡桥等地属国民党高邮八区。一九四七年四月下旬，我们进入这块地区后，首先在靠近淮宝的宝应湖边和三河南岸边活动，逐步向南发展。在这段时间里，我高宝武工队与两个支队密切配合，利用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积极为他们提供情报，当好向导，搞好后勤服务；两个支队则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先后在涂沟、银集、塔集连战连捷，歼灭了敌人一个渔警队和整编第四师两个工兵排。这两仗，震动了整个小河东，广大群众奔走相告：“新四军又回来了，这下子有希望了！”而敌人真以为我军主力打回来了，反动气焰大为收敛，惶惶不可终日，不少地主土顽吓得纷纷将家属迁往运

东。我们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一面发动群众开展拖捐抗捐、拖租抗租乃至惩奸复仇、分粮分物等各种斗争，积极参加和支持游击战争；一面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的基层政权和土顽武装。当时我们采取的斗争策略是：孤立极少数反动分子，争取大多数中间分子，对群众所痛恨的罪大恶极的土顽头目和地主特务，一经抓获，坚决镇压；对反动派内部的动摇分子，尽量争取其为我们利用，逐步将敌人的政权变为我们的政权。如德兴乡顽乡长万九香在涂沟战斗中被我活捉后，因其叔父当时是国民党宝应县党部的执行委员，颇有权势，我们便与万九香谈妥了几个条件，然后主动将其释放。后来他虽然在名义上还是国民党乡长，但在暗地里却经常为我们搞报情、买子弹。我们还动员土顽家属感化其亲人改邪归正，取得了显著效果，先后开小差向我投诚的顽自卫队员达六十余人，带回步枪四十余支。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我们初步在小河东北部站住了脚，建立了北湖、银涂两个区和部分乡级政权，以反民兵、农会等群众组织。后来，敌人虽然曾向小河东地区搞过一些比较大的“扫荡”，但敌人一来，我们就下了湖荡、进了柴滩；敌人一走，我们又活跃在各地。

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李世农、魏然同志率一个武装营和一个干部大队（队长沙流辉，教导员李锐）从山东南下到达淮宝。七月十二日，淮南工委和淮南支队在吕良桥成立。七月十八日，魏然、徐速之率淮支三营和一批地方干部进入小河东，收复塔集、闵桥、夹沟、横荡桥，全面控制了小河东地区。为适应新的形势，淮南工委决定撤销五工委，成立高宝县委和县政府，由孟家芹任书记，陶滔任副书记，张静江任县长，许采文任副县长，下辖银涂、闵塔、北湖、南湖

四个区署，十七个乡公所，一百多个村政权。当时，因局势尚不够稳定，县委、县政府没有固定驻地，也未设各个科局，基本上是游击式的武装政权。其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征粮征款，配合部队，打击土顽，逐步恢复基层政权和重建党的组织。那时，高宝县的干部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北撤到山东、苏中后重新打回来的干部，他们是县、区、乡的主要骨干；二是在敌后游击战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是干部队伍中的新生力量；三是北撤时未走又重新参加工作的回归干部，由于他们过去受过党的多年教育，北撤后又受过敌人的种种迫害，所以在重新工作后一般表现都很积极，这批人数量很大，是当时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乡以下干部基本都由他们担任。我们就是依靠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在小河东坚持敌后斗争的。在党的教育下，绝大多数干部都能在战斗中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在平时工作中，处处关心群众疾苦，做群众的贴心人。一九四七年夏，因连降暴雨，湖水猛涨，北湖区几十里环湖圩堤受到了严重威胁，刚建立不久的北湖区署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区委书记、区长王定安等几十名党员干部，冒着生命危险，带领一千多名群众跳下水去，筑起人墙，与风浪连续搏斗两昼夜，终于使全区两万多亩稻田转危为安，秋季获得了丰收。广大群众感慨地说：“这次发大水，多亏来了新四军，才使我们灾年获得好收成；要是国民党那些老爷还在这块地方，说不定我们早就逃荒要饭、家破人亡了。”为了用实际行动感谢党对他们的关怀，支持游击战争，全区在三天半时间内，就完成了八万石公粮的上交任务。象这种干群之间血肉难分，休戚与共的动人事例，几乎各区乡都有，这是当时我

们在小河东得以立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奋 战 芦 苇 荡

小河东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使运河东高邮、宝应的敌人大为恐慌。他们成立了一个所谓“高宝湖清剿指挥部”，纠集了敌孙良诚保安纵队一个团和高邮、宝应、淮阴、淮安四县保安队约两千人，并有敌海军第七舰队十八艘舰艇配合，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分三路由唐港、夹沟、闵桥管荡口登陆，向小河东大举进犯。淮支三营抗击一天，尔后向淮宝转移。高宝县委在事前就获得情报，及时布置干部向湖荡转移。在转移中，王世荣、华汉光、高长禄等几名乡干被敌杀害。

敌人“扫荡”小河东不久，据初步侦察，“扫荡”敌军已返回运东，驻银集敌军只有保安队一个中队。淮支三营乃于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凌晨渡过三河，突袭银集。不料战斗打响后，才发现在头天晚上银集新到敌军一个团（准备去淮宝扫荡）。因敌我兵力悬殊过大，致使战斗失利，淮支三营损失很大，被迫撤至淮宝休整。高宝县委及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人虽然重新占领了小河东，但决不会长久，一旦我军主力南下，局面便会很快改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能擅自放弃阵地，再搞第二次北撤。只要我们的人一天不离开高宝，群众就会看到希望，敌人就会坐立不安。我们应充分利用湖荡、柴滩的有利地形，保存有生力量，继续坚持斗争，迎接未来的反攻。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全县以区为单位组成了三支武工队，分别进入宝应湖中的瓜子铺、人字头、蔡花港等大片柴滩，采用昼伏夜出的办法同敌人周旋。

当时划分的活动范围是：北湖区武工队负责涂沟一带；银涂区武工队负责银集一带；闵塔区武工队负责金沟、闵塔一带。县委、县政府几名负责同志直接下去，分头领导各区的活动。从夏末到冬初，我们这支总共两百多人的武工队，在柴滩上坚持斗争近三个月。这是我们在自卫战争中所经历的最困难、最艰苦的一个阶段。

当我高宝武工队陆续转移到柴滩以后，敌人立即对柴滩周围进行了严密封锁。在水上，他们用汽艇封锁水面，日夜不停地巡逻，稍有动静，随即用机枪扫射和小钢炮乱轰；在陆地，他们遍设关卡岗哨，四处张贴布告，严禁群众下湖，妄图切断我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把武工队困死在柴滩。敌人还讥讽我们当时的处境是所谓“蒿草县、芦柴区、水上乡、小船村”，好象我们一下柴滩，他们的胜利更指日可待了。可是，敌人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恰恰正是那些敌人所看不上眼的湖荡柴滩，却帮了我们武工队的大忙，使敌人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由于当时湖里的蒿草、水草非常茂盛，如同设下了无数天然障碍，敌人的巡逻艇经常被缠得难以通行，而我们武工队的小船则可以自由来往，湖荡成了我们的天下。由于当时滩上的芦苇长得又高又密，如同一望无边的青纱帐，敌在明处，我在暗处，敌人搜不到我们，而我们却可以与敌人“捉迷藏”，机动灵活地进行“麻雀战”，一有机会，便集中兵力主动出击。依靠这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我们不仅在柴滩上逐步站稳了脚跟，而且经常在夜间摸上岸去奇袭敌人，先后打过唐港、涂沟、黎城等上顽据点，搞得敌人一夜数惊，草木皆兵。当敌人兴师动众地前来“围剿”时，我武工队早就钻进柴滩，无影无踪了。

在柴滩上打游击，虽然地形对我十分有利，但是生活却异常艰苦，最大的困难是“吃、住、穿”三个字。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努力，“靠水吃水，靠滩吃滩”，较好地克服了这些困难。开始，因为每人带上滩两米袋粮食，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粮食吃光了，一时又接不上，我们就发动大家就地取材，挖藕、苕蒿根和捞野水芹充饥；有些同志还想法摸了些鱼虾、打了些野鸭来改善生活。鱼、虾、野鸭本来都是野味鲜美的好菜，可是因滩上无油无盐，加之水浑沙多，结果烧熟后不仅淡而无味，而且腥气扑鼻，很难下咽；由于长期缺少油盐和蔬菜，造成体内火大，使得许多同志鼻孔流血。但是，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同志们硬是强迫自己一口又一口地咽了下去，终于一天又一天地熬过来了。滩上没有房屋住，我们就搭起一个个芦柴棚，勉强遮遮风雨，总算安了个“家”。可是，夏秋季节中午热，晚上冷，滩上的蚊虫白天都咬人，搞得人无法休息。没有芭蕉扇，我们就自己动手编织芦柴扇；没有蚊帐，就在小船里辟上半舱水，把它变成一顶顶“水帐子”，从而取得了休息的权利。进入初冬季节后，气温不断下降，可是我们既无棉衣，又无棉被，每人身上仍是单衣薄衫，冻得实在难受。为了战胜寒冷，我们利用芦苇即将成熟的天然条件，人人动手采摘芦花，自做芦花被；白天通过出操跑步来取暖，晚上钻进芦花被中去御寒。后来，县委又发动大家割柴，每人任务六十捆，托路过的商船运往宝应，换回了一批棉花、棉布，自做棉衣、棉被，基本解决了过冬的问题。我们就是这样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在柴滩上顽强奋斗了三个月，不仅没有被困死、饿死、冻死，而且锻炼出一批英勇顽强、百